論　著

教會大學與中國女子高等教育

王奇生*

一、前言

西方傳教士對近代中國婦女生活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戒纏足，二是興女學。其中尤以興女學影響最著。自 1844 年傳教士在寧波創辦第一所女塾算起，教會女學在中國前後持續了上百年。從普通教育、師範教育、職業教育至特種教育，從小學、中學至大學，教會女學形成了一套相對獨立和較為完整的教育體系和辦學模式。在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上，教會女學起到了某種程度的開創作用，並為中國人自辦女學提供了不少可資借鑒的經驗。

近代中國教會女學的發展，大致可以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 19 世紀中葉至 19 世紀末，是教會女學步履蹣跚的初創時期，數量少、程度低（以小學為主）是這一階段的顯著特徵；第二階段從 20 世紀初至 20 世紀中期（1951 年前後），是教會女學狂歌猛進的發展時期，數量增多，規模擴大，辦學重心由初等教育轉向中等和高等教育。教會學校不僅

*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第 4 期（1996 年 8 月）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開創了中國的女子高等教育，而且當中國人自辦女學興起和發展使得教會女子初等和中等教育變得無足輕重之後，教會女子大學教育依然保持著領先地位和第一流的水平，為中國第一代新知識女性的成長提供了一塊重要的人才培養基地。三、四〇年代，教會大學培養了占全中國女大學生總數的 30% 左右的學生。在當時中國大學女畢業生還不多的情況下，她們在我國婦女界高級知識分子中占有一定比例。

以往研究教會女學史的學者大多將研究重點放在第一階段的女子初等教育上，而對第二階段教會女學的發展，尤其是對這一時期的女子高等教育涉論不多。① 而教會女子高等教育作為教會女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正是其中最具特色和影響最著的一環。本文試圖對近代中國的教會女子高等教育的發展演變及其在中國第一代新知識女性的成長過程中所充當的母體角色作一簡要的概述。

二、起源與發展：教會女子高等教育的歷史演變

20 世紀上半期的教會高等女學以五四為界，呈現出前後不同的格局。在五四以前，教會大學採行男女兩性雙軌制的學制，即男女大學分開設立，普通的教會大學只招收男生，女子大學單獨設置。五四以後，只招收男生的教會大學先後對女子開放，而原有的女子大學則繼續保持其單性大學的性質。因此，五四以後的教會大學實際上是一種混合雙軌制。

1905 年 5 月，中國基督教教育會在上海召開會議。會議決定要在中國建立 4 所女子大學：華北、華中、華西、華南各 1 所。② 但直至五四以前，教會女子大學總共只建成 3 所，即 1905 年創辦的華北協和女子大學，1907 年創辦的華南女子大學和 1915 年創辦的金陵女子大學。華西女子大

① 〔美〕杰西・格・盧茨 (Jessie G. Lutz) 著，曾鉅生譯：《中國教會大學史》*(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年）和黃新憲著：《中國近現代女子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 年），二書中各列小節有所介紹。

② 〔美〕華惠德 (L. Ethel Wallace) 撰，游捷譯：〈初創時期的福建華南女子大學〉，載《教育評論》（福建，1990 年），期 1，頁 60。

學始終未能建成。1920 年，華北協和女子大學併入燕京大學。此後，基督教女子大學只剩下兩所。1937 年又有一所教會女子大學創辦於上海，即震旦女子文理學院。該院為美國天主教會主辦，其組織仿效金陵女子大學。但因創立較晚，而且十分保守，畢業學生多數沒有從事社會工作，在近代中國影響甚微。

從 3 所基督教女子大學的起源來看，除金陵女子大學是一開始即作為大學創辦的以外，華北協和女子大學和華南女子大學均是由中學和初級學院發展而來的。而那些作為女子大學前身的教會女校在其最初並沒有想到要為中國婦女提供高等教育作準備。杰西·格·盧茨認為，中國教會大學的興辦，主要歸之於「教會學校的自豪感和有力地證明自己的有用性和生命力的自然願望」，以及要「使上等階層皈依基督教，以期通過他們影響百姓」。③ 而 19 世紀 80 年代以後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態度的普遍變化，為教會大學在中國的建立提供了適宜的社會文化土壤。教會女子大學的創辦與一般教會大學的起源既有相通之處，亦有不同之點。

19 世紀下半期教會女子小學和中學的發展，毫無疑義為 20 世紀初教會女子大學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華南女大創立時，主持校舍奠基典禮的美國美以美會會督稱：「這個大學的締造，在中國，在我們生活中，不是一個突如其來、不相連貫的偶然事實，而是 50 年來我們教會在福州為婦女所做教育工作的正常結果」。④ 華南女大的前身是 1859 年創立的福州毓英 (Uk Ing) 女子寄宿學校。在此之後數十年間，在福州及其附近地區相繼建立了一些以實施初等教育為主的教會女校。如果不是這些教會女校「為女孩子打開初等教育的局面，在半個世紀後，夢想有一個女子學院是不可能的」。⑤ 金陵女大創立的一個重要動因，也是鑒於當時江浙一帶各教會女子中學日臻發達，女子中學畢業生在國內無升學場所；另一方面，各教會女子中學欲延聘大學畢業的中國女教師而不可得。⑥ 據統計，20

③ 杰西·格·盧茨：《中國教會大學史》，中譯本，頁 2、16。

④ 同註②，頁 63。

⑤ 同註②，頁 59。

⑥ 〈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20 周年紀念特刊〉，載《申報》，1935 年11 月2 日。

年代初僅江蘇一省就有美國教會女校 22 所，入學學生達 2,068 人。⑦ 教會女子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發展呼喚著教會女子大學的建立。

就中國社會文化土壤而言，戊戌維新前後，一批受到西方影響的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談論女子教育的重要性。1898 年，中國人自己創辦了第一所女學 —— 經正女學堂。1901–1903 年，國人自辦女學增至17 所。社會對女學態度的轉變迫使上層統治者作出回應。1906 年 2 月 21 日，慈禧太后面諭學部，振興女學。翌年 3 月，〈奏定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師範學堂章程〉頒布。儘管這些章程尚殘留著濃厚的封建色彩，但官辦女學的閘門畢竟打開了。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朝野在女子教育態度上的轉變十分敏銳，感到在中國建立女子大學的時機已經成熟。1911 年美國美以美會在中國的教育秘書蓋蒙韋爾洛 (Frank D. Gamewell) 即撰文指出：「近年來中國的急速變化，需要受過高級訓練的婦女來擔任教育工作的要求日益迫切。天意授予我們去促進已在福州實施的一所女子大學的計畫」。⑧ 很顯然，20 世紀初中國社會的轉型與劇變為教會女子大學在中國的興起提供了適宜的土壤。

表 1 近代來華基督教女傳教士人數及比例

時間	傳教士總數	男傳教士人數	女傳教士人數			女傳教士所占比例
			獨身	已婚	合計	
1876 年	817	410	63	344	407	49.8%
1889 年	1,296	589	316	391	707	54.6%
1905 年	3,445	1,443	964	1,038	2,002	58.1%
1915 年	5,338	2,103	1,581	1,654	3,235	60.2%
1917 年	5,900	2,263	1,818	1,819	3,637	61.6%
1920 年	6,204	2,285	2,015	1,904	3,919	63.2%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基督教百年史》載 1877、1890 年第一、二次傳教大會報告，1907 年百年傳教大會資料及《中華歸主 —— 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附錄 8 中國基督教宣教會 1920 年統計資料綜合整理而成。

⑦ 王樹槐：《中國現代化的區域研究 —— 江蘇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 年），頁574。

⑧ 同註②，頁 64。

此外，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來華女傳教士群體結構的變化。與早期相比，這個時期來華女傳教士人數有顯著增長。1876年，基督教女傳教士只有407人，到1905年增至2,002人，1915年復增至3,235人。在性別比例上，女傳教士占基督教在華傳教士的半數以上。其次，這個時期單身女傳教士（一般稱為師姑）的比例明顯上升。在早期，女傳教士多為與丈夫同來的傳教士的妻子（一般稱為師母）。1876年，單身女傳教士只占來華女傳教士總數的15%，到1905年，單身女傳教士的比例上升到48%，1920年進一步上升到51%（見表1）。

此外，這個時期來華女傳教士的文化程度明顯提高。在早期，來華女傳教士多為中小學文化程度，教會女校的開辦者也多非專門辦教育的人。到20世紀初，許多美國大學相繼取消了對婦女的限制，女大學畢業生人數日漸增多。據1900年統計，是年美國大學畢業女生共5,237人。⑨ 正在這個時期，基督教青年會、女青年會、學生志願運動團在美國大學生中徵召赴海外傳教工作者，不少大學男女青年積極響應。當時，受過大學教育的美國婦女的職業出路主要是做小學教師，不僅薪俸微薄，而且升遷渺茫。相比之下，赴海外傳教，猶如拓荒探險，雖險猶榮，能得到社會的肯定、心理的補償。正是在這種情勢下，一大批美國女大學畢業生踏上了東方之旅。她們中許多來自美國中西部小城教士之家。她們在大學畢業後，不少曾在鄉村小學教過幾年書。⑩ 來華後，除部分從事傳教和醫護工作外，多數進入教會學校任教。其中不乏女權主義者，其男女平等觀念和毫不妥協地與持歧視態度的習慣勢力做鬥爭的精神也隨之輸入中國。在美國，婦女雖不像中國婦女飽受了數千年舊禮教的束縛，可是她們接受高等教育的歷史並不悠久，而且她們踏入大學校門也曾經經歷過一段艱辛的歷程，並不像某些學者所論斷的歐美婦女自民主革命之後便在各個方面享受了自由和平等權利。事實上，直至19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各個州的法律還相當普遍地存在著對婦女的歧視。在19世紀初，美國婦女要獲得任何一種教育

⑨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70 Edition), p. 659，轉引自趙文藝：《我國近二十年來女子高等教育發展之研究》（臺北，1970年）。

⑩ 李又寧：〈書評：韓特著：斯文的福音〉，《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期3，頁190。

都是很困難的。大約從 19 世紀中後期開始，隨著女權運動的興起，美國婦女的狀況才逐漸改觀。各州開始修改那些帶有歧視婦女性質的法令，中小學一般都對婦女開放了。但為了獲得更高層次的教育機會，美國婦女作了不懈的努力。雖在南北戰爭以前，已有少數大學對婦女開放了，但多數大學在很長時間裡堅決反對男女同校。鑒此，在南北戰爭以後，美國一些有識之士發起創辦專門性的女子大學，如瓦薩（ Vassar， 1861 年）、威爾斯利（ Wellesley， 1860 年）、史密斯（ Smith， 1871 年）和布賴恩・瑪爾（ Bryn Mamr， 1885 年）等。⑪ 19 世紀末20 世紀初來華的美國女傳教士中，有的便是這些女子大學的早期畢業生。可以肯定，當她們想為中國婦女提供高等教育機會時，最先必是受了其母國女子大學的直接啟示和影響。當一批教會大學男校在中國建立以後，一批女傳教士的競爭感助長了她們在中國創辦女子高校的雄心。伊麗莎白・菲希爾小姐 (Miss Elizabeth Fisher) 便是其中之一。 19 世紀 80 年代，福州女子寄宿學校的女傳教士們開始夢想創辦一所女子大學。在該校任教的菲希爾小姐最先「投下一顆炸彈」，在一次福州「婦女之夜」的年會上，她向與會的傳教士們大聲疾呼：「人們給我們女孩子多少教育？如果已經給男孩子中等教育，那一定也要給女孩子中等教育；如果已經給男孩子大學教育，那就一定要給女孩子大學教育」。⑫ 她簡樸的講話如同一篇教會女子大學的「人權宣言」，為中國教會女子大學的創立作了輿論準備。

中國教會女子大學的創辦者和早期教職員中頗有一批像菲希爾小姐這樣的女傳教士。她們富有學識、能力和事業心，熱中於中國婦女高等教育事業。金陵女大的第一任校長德本康夫人 (Mrs. Laurence Thurston) 即是一位「有過 11 年中等教育工作經驗，既了解中國教育現狀，又熟悉美國密西西比河以東 40 所大學及參加建校的教會組織領袖的女傳教士」。⑬ 華北協和女大的首任校長麥美德 (Miner Sluella)， 司徒雷登 (Stuart John

⑪ 〔美〕洛伊斯・班納 (Lois W. Banner) 著，侯文蕙譯：《現代美國婦女》（北京：東方出版社， 1987 年），頁 4。

⑫ 同註②，頁 59。

⑬ 孫海英：〈金陵女子大學的前前後後〉，《鼓樓文史》（南京， 1992），輯 4，頁 2。

Leighton) 稱讚她「是一位具有罕見的洞察力和工作能力的女性」。⑭ 同樣，華南女大的第一任校長程呂底亞 (Miss Lydia Trimble) 也是一位富有教育工作經驗的女傳教士。在就任華南女大校長之前，她曾單槍匹馬在福建的海濱城鎮龍田獨立創辦過一所女子寄宿學校，成績卓著。1904 年 5 月，程呂底亞回洛杉磯參加美以美會的大會。在這次會議上，她向婦女外洋布道會的官員們呼籲在南中國建立一所女子大學。會議同意並授權她與另外兩位女傳教士組織一個委員會，具體籌備建校事宜。其後，程呂底亞擔任華南女大校長 17 年，為華南女大的早期建設盡了很大的力量。總之，中國教會女子大學的興起與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來華女傳教士群體結構的變化有著緊密的聯繫。

通觀 20 世紀上半期中國教會女子高等教育的發展史，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義和團運動以後至五四以前為初創時期；五四以後至抗戰以前為發展時期；抗戰及戰後為鼎盛時期。

同早期教會大學男校一樣，早期教會女子大學的規模都很小。圖書館和實驗設備簡陋不堪，教師人數和所開課程十分有限。金陵女大開辦時，只有 6 名教職員，教學設備只有一間普通化學實驗室、兩架鋼琴，主要的圖書只有《大英百科全書》一部。校舍未建，租賃南京繡花巷李鴻章花園故址作臨時校址。首期學生入校時甚至產生疑問：「難道這也算是大學嗎？」⑮ 同樣，華南女大剛創辦時，只有幾個教職員，只設預科班。開辦 7 年後才開始招收大學本科生。但因師資力量不夠，學校只開設了一、二年級課程。學生讀完這兩年課程後，學校要求她們到其他地方去完成三、四年級的課程。直到 1917 年，華南女大才開設了正規的大學四年的全部課程。這時學校開辦已有 10 周年了。

雖然如此，早期教會女子大學的創辦者們信心十足，而且自許甚高。華南女大自稱是「迄今在上海以南，為婦女設計的唯一大學」。⑯ 華北協

---

⑭ 司徒雷登：〈燕京大學 —— 實現了的夢想〉，見陳學恂：《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 年），下冊，頁 196。

⑮ 吳貽芳：〈金女大 40 年〉，載《江蘇文史資料選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 年），輯 13，頁 2。

⑯ 同註②，頁 63。

和女大校長麥美德則更驕傲地說：「南至長江，北至北極，東至太平洋，西至堪司炭廳，以偌大地點，僅此女子大學一處，其責任亦雲重矣」。⑰ 當時，國人尚未設立女子大學，教會首開先河，自然有獨占鰲頭之感。

早期教會女大學生有這樣幾個特點：

㈠入學人數少，畢業率低。早期教會女大普遍感到生源有限，招生困難，而且只有部分人能自始至終堅持學完 4 年課程，學生中途輟學的比例甚高。如金女大第 1 期招收新生 11 人，讀完大學一年級的只有 9 人，讀完大學四年級的只有 5 人；第 2 期招收新生近 20 人，畢業時只剩8 人，⑱ 畢業率為 40–45%。華北協和女大自 1905 年創辦至 1920 年併入燕京大學，前後畢業學生共計 72 人，其中本科 31 人，專科 41 人。⑲

㈡學生年齡偏大。當時，教會女大要求新生必須具有高級中學畢業程度。在那時，中國女子教育興起不久，女子入學晚，待到高級中學畢業時，不僅年齡偏大，而且相當成熟了。不少學生在上大學前曾任過教師甚至校長。如金女大首期學生 11 人中有 10 人曾教過書，教齡短的 1 年，長的7 年。⑳ 由於年齡大，自律性強，認識到自己是中國第一代女大學生，所以都認真讀書，渴望求得學問。

㈢畢業後深造率高。如華南女大首屆 5 名畢業生中，有 4 名留學美國和加拿大。㉑ 金陵女大前四屆畢業生 33 人中，赴美深造獲得碩士博士學位者有 20 人。㉒ 她們大都事業有成。她們的成就及其所擔當的角色，為初期教會女子大學贏得了較佳的聲譽。

對大學高等女子教育來說，五四前後的變革具有重要的劃時代意義。其中一個最重大的變革是教會大學男校相繼對女子開放。一般認為，中國大學開女禁，肇始於 1919 年國立北京大學。實際上，在北大之前，廣州嶺

---

⑰ 麥美德：〈中國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概論〉，載《中國基督教會年鑒》（1917 年），輯 4。

⑱ 孫海英編：《金女大大事記》（金陵女子學院自印，出版時間不詳），頁 1–3。

⑲ 《中華歸主——中國基督教事業統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年），頁 935。

⑳ 同註⑮，頁 2。

㉑ 同註②，頁65。

㉒ 同註⑱，頁 4。

南大學曾一度招收過女生，招收對象多為本校教員的女兒。1920 年，嶺南大學正式准許女子入校學習。是年，該校共有女生 28 人，而北大只招收了 9 人。翌年，嶺南第一個女畢業生獲得文學學士學位，成為中國男女同校後畢業的第一名女大學生。可以說，在中國大學開女禁史上，教會大學嶺南與國立大學北大共同扮演了開路先鋒的角色。

繼嶺南之後，其他教會大學也先後向女子開放了。到 1929 年，全國 34 所大學中，兼收女生的有 29 校。㉓ 13 所基督教大學中，只有聖約翰大學開放女禁較晚：直到 1936 年以前，聖約翰「始終為一所男性學校」。1936 年，上海聖馬利亞女中 12 名畢業生因政府規定已立案的大學不得招收未立案中學畢業生而升學無門，遂向屬同一差會的聖約翰大學提出申請。該校無奈，才被迫開放女禁。㉔ 在教會大學中，兩所天主教大學開放女禁最晚：輔仁大學和震旦大學直到 1938 年前後才開始招收女生。

多數教會大學男校向女子開放後，教會女子高等教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入教會大學的女生人數成倍地增長。1920 年，教會大學在校女生總計 117 人，1925 年增加到 530 人，㉕ 1931 年復增至 825 人，㉖ 1934 年進一步上升為 1,236 人。㉗ 14 年間，教會大學女生人數增長了 10 倍以上。在五四以前，教會女子高等教育由 3 所女子專門大學獨力承擔，五四以後，發展為全體教會大學共同肩負。1920 年，金女大和華南女大兩校學生人數約占教會大學女生總數的 60%，到 1934 年，這一比例下降到 23.4%，其餘 76.6% 分別由燕京、嶺南，金陵、齊魯、滬江、東吳、華中、華西等大學培養。在這些教會大學中，以燕京招收的女生人數最多，其次為滬江、齊魯、嶺南，金陵、華中、之江、福建協和等校較少。華中、之江和福建協和是因為學校規模較小，金陵則可能是與金女大同處一地，生

㉓ 俞慶棠：〈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女子教育〉，見莊俞等編：《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國教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 年），頁 207。

㉔ 阮仁澤、高振農主編：《上海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年），頁 926。

㉕ 同註③，頁 127。

㉖ 《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上海：開明書店，1934 年），丁編，頁 34–37。

㉗ 國民政府教育部編：《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1936 年10 月出版），頁 80–81、158–159。

源受金女大影響的緣故。就各校男女生比例而言，滬江女生比例最高，據30 年代中期的統計，滬江女生約占全校學生人數的 1/3；其次為燕京，約占 30%。華中女生人數雖然不多，所占的比例卻頗可觀，僅次於滬江和燕京（見表 2）。

表 2　教會大學女生人數及比例

		燕京	嶺南	金陵	齊魯	滬江	東吳	華中	華西	金女大	華南
1931 年	人數	233	70	32	71	168	43	16			
	占全校學生比例 (%)	28.7	24.6	5.9	21.8	30.8	10.7	21.6			
1932 年	人數	226	84	63	82	163	43	32		192	56
	占全校學生比例 (%)	28.7	23.9	11.2	21.1	32.5	12.7	30.5			
1933 年	人數	255	102	78	98	199	89	40	92	212	64
	占全校學生比例 (%)	31.3	24.9	13.3	23.1	33.7	13.8	32.5	26.2		
1934 年	人數	249	103	76	109	169	105	35	100	214	76
	占全校學生比例 (%)	31.1	22.8	11.9	24.5	31.2	19.0	26.7	29.2		

資料來源：根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全國高等教育統計》民國 20–23 年度所載相關資料整理而成。

燕京在五四以後的教會女子高等教育界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燕京大學內設有女部，其前身起源於華北協和女大。1920 年華北協和女大併入燕京後，最初在北京城內分設男女兩校。燕京男校在崇文門內盔甲廠，燕京女校在燈市口同福夾道。1926 年夏，燕京西郊新校舍落成，男女兩校乃同時遷入。遷入後，教務行政完全合併，但為了便於管理，校組織大綱內仍規定分設女部，並設女部管理委員會處理關於女部的各種問題。燕大女部規模發展很快，1924 年，燕大在校女生 113 人，占全校學生總數的 25.8%；到 1935 年增至 274 人，占全校學生總數的 31%。㉘ 在 20 年代，金女大人數在教會大學女生人數中一直獨占鰲頭。從 30 年代起，燕大女生人數躍居金女大之上。另外，1922–1936 年間，燕京共畢業女生 393

㉘　燕京大學編：《私立燕京大學一覽》（1936–37 年度），頁 182–183。

人，㉙ 與同期金女大畢業生人數（403 人）不相上下。

抗戰時期，教會大學受到戰爭的衝擊，一些學校輾轉內遷，圖書和教學設備損失慘重，辦學條件十分艱苦。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教會大學女生人數在戰時不但沒有減少，相反得到了較快發展。如聖約翰大學在 1936 年剛開女禁時，只有 7 名女生，到 1941 年竟增至 400 名女生，占全校學生總數（1,200 人）的1/3。㉚ 據稱戰時國立大學也有類似的情況：女生人數激增，女生所占的比例比戰前顯著提高。據統計， 1945 年全國大學在校男生人數比 1936 年增長 1.9 倍，而同期大學在校女生人數增長 2.49 倍。㉛ 析其原因，其一，有賴於政治當局的提倡，如〈抗戰建國綱領〉有關教育之四項方針，其中之一即為「訓練婦女，俾能服務於社會事業，以增加抗戰力量」。㉜ 1940 年，教育部為促進女子高等師範教育，於四川江津設立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以重奠女子高等教育之基礎。其二，女子高等教育的演進有賴於女子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發展，女子初等和中等教育經過戰前十年的培育，已具相當規模，這為戰時女子高等教育的發展提供了比較充足的生源。其三，婦女解放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緊密相連，在抗日戰爭的洪流中，居人口半數的中國婦女受到空前的大動員，她們挺身走出家庭，參加抗戰，表現出相當的熱誠與毅力，婦女的社會、政治地位因而提高，女子教育亦隨之而演進，而且這種趨勢在戰後也不可逆轉。據 1947 年國民政府教育部統計部分教會大學女生人數，其中輔仁大學 929 人（占全校學生總數的 38.9%），滬江大學 471 人 (44.3%)，震旦大學 520 人 (41.9%)，華北協和大學 688 人 (38.5%)。㉝ 各校女生所占比例之高，已接近並且有的甚至超過同期美國大學女生的比例。㉞

㉙ 同上。

㉚ 同註③，頁356。

㉛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上海：商務印書館， 1948 年），第 14 篇，頁 1413。

㉜ 教育部高教司編印：《最近高等教育概況》（1942 年 1 月），頁 2。

㉝ 《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上海：商務印書館， 1948 年），高等教育篇，頁 654、660、663、669。

㉞ 美國大學內女生所占的比例： 1900 年 19.1%， 1910 年 22.7%， 1920 年34.2%， 1930 年39.9%， 1940 年41.3%， 1948 年35.2%。引自趙文藝：《我國近 20 年來女子高等教育發展之研究》（臺北， 1970 年），頁 110–125。

三、「華南姐」與「金女士」：兩所教會女子大學的比較

自華北協和女子大學於 1920 年併入燕京大學後，教會女子大學便只剩下了金陵女子大學和華南女子大學兩所。欲明瞭教會女子大學的辦學特色及其發展歷程，金女大與華南女大自然是本文的重點考察對象。五四以後，金女大和華南女大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教師和學生人數逐年增加，系科和課程設置日趨完善。兩校均募得大筆款項，營建了各具特色的新校舍：華南女大的建築風格以西式為主，巍峨堂皇，引人注目；金女大則採取中國傳統對稱的宮殿式建築，顯得古樸、典雅、莊重。當時教會大學大部分在國外註冊，金女大與華南女大亦分別於 1919、 1922 年向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申請註冊，均被該校核准立案。自此，兩校畢業生可以不經考試直接進入美國大學留學深造。 1927 年以後，中國政府提出收回教育權的要求，規定外國教會在中國辦的大學要建立以中國人為多數的校董會，並由中國人擔任校長。兩校均順應時勢，改選中國人當校長。金女大校長吳貽芳，華南女大校長王世靜，兩人均曾留學美國密西根大學，吳貽芳獲博士學位，王世靜獲碩士學位。吳執掌金女大 23 年，王執掌華南女大近 20 年，是近代中國大學中任職時間最長的兩位女校長。兩人為基督教女子高等教育的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1930 年 12 月，金女大由南京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 6 年後，華南女大亦核准立案。依照當時南京政府教育部制訂的大學組織法，高等院校必須有 3 個學院才可稱為「大學」，金女大和華南女大均只有文、理兩個學院，乃分別改名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和「華南女子文理學院」。不過習慣叫法仍稱之為「金女大」和「華南女大」。

學校名稱由「大學」易為「學院」，名義上降了一級，但實際上，無論是教師和學生人數、系科及課程設置，還是圖書實驗設備和校產規模，兩校均有不同程度的發展。其中金女大發展較為顯著： 1924 年在校學生 135 人， 1926 年 165 人， 1934 年 238 人， 1936 年259 人， 1937 年350

人。抗戰初期，因受戰爭衝擊，學校西遷，入學人數一度減少，但至抗戰中期逐漸恢復，1944 年在校學生為320 人，1945 年為 348 人，1947 年達 440 餘人，1948 年超過 480 人。㉟ 金女大剛開辦時，只有教職員 6 人，1927 年增至 46 人，1945 年增至 86 人。圖書及教學設備也添置較快，到抗戰前夕，金女大中外文圖書已達 10 萬冊，教學儀器設備可供 400 名學生實習之用，另有鋼琴 20 餘架，㊱ 校產總值在 150 萬元以上。㊲

抗戰期間，金女大輾轉上海、武昌，最後集中遷至成都，借地自建校舍辦學。華南女大則遷往閩西北山城南平。戰爭雖然使兩校校產遭受了重大損失，但學校聲譽並未因戰爭而稍減。兩校當局為順應抗戰需要，及時調整了辦學方針，使學校更加貼近了中國民眾。

抗戰勝利後，兩校相繼遷回原址復課。1951 年，金女大與金陵大學合併，華南女大與福建協和大學合併。至此，結束了兩所教會女子大學 36 年（金女大）和 44 年（華南女大）的歷史。1952 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在金女大和華南女大基礎上分別改建成「南京師範學院」和「福建師範學院」。

從比較中審視兩所女子教會大學的辦學特色，不難發現兩校的相通和相異之處。

華南女大的創辦比金女大早 8 年。前者由美國美以美會獨家資助；後者由美國美以美會、監理會、浸禮會、基督會和北長老會等 5 個差會聯合資助。華南女大開辦時，只獲得美以美會資助的 1.5 萬美元；而金女大開辦時，5 個差會各承擔開辦費 1 萬美元，經常費 6,000 美元。對早期中國教會大學來說，各差會的資助是學校得以生存和發展的主要經濟來源。在這方面，華南女大一開始便比金女大稍遜一籌。此後，金女大在經費籌措方面始終走在華南女大的前面。如 1921 年金女大校長德本康夫人 (Mrs. Laurence Thurston) 為金女大一次籌集到 60 萬美元的建築經費；而華南女大直到 1924 年為解決基建費用短缺的困難，不得不動員學生向家長和

㉟ 同註⑱，頁 5–46。

㊱ 同註⑱，頁 12。

㊲ 同註⑥。

親友捐款 2 萬元，經費成為制約華南女大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金女大創辦雖較華南女大為晚，但因經費比較充足，很快後來居上。1919 年，金女大首屆畢業生 5 人獲得學士學位；而華南女大直到 1921 年才首次有 3 名學生修完大學本科課程畢業。其後，金女大人數逐年遞增，聲譽日隆；相比之下，華南女大顯得捉襟見肘，步履蹣跚。據 1934 年統計，華南女大的系科設置和圖書藏量不及金女大的一半，在校生和畢業生人數僅及金女大的 1/3（見表 3）。

表 3　金女大與華南女大比較（1934 年度）

<table>
<tr><th colspan="2">學校名稱</th><th>金女大</th><th>華南女大</th><th>學校名稱</th><th>金女大</th><th>華南女大</th></tr>
<tr><td colspan="2">校地面積（畝）</td><td>160</td><td>40</td><td>教職員</td><td>58</td><td>30</td></tr>
<tr><td colspan="2">校產價值（元）</td><td>128,578</td><td>97,754</td><td>在校生</td><td>214</td><td>76</td></tr>
<tr><td colspan="2">歲入經費（元）</td><td>137,816</td><td>112,180</td><td>畢業生</td><td>40</td><td>13</td></tr>
<tr><td rowspan="2">系科編制</td><td>系</td><td>11</td><td>4</td><td>圖書（冊）</td><td>56,950</td><td>23,772</td></tr>
<tr><td>科</td><td>1</td><td>1</td><td>課程總數</td><td>75</td><td>59</td></tr>
<tr><td colspan="2">備　　註</td><td colspan="5">①課程總數為 1932 年的統計數字。②金女大校產價值與圖書數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 20 周年紀念特刊〉所載出入甚大。</td></tr>
</table>

資料來源：根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編：《23 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有關數據綜合整理而成。

華南女大發展緩慢，學生來源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該校地處福州，主要面向福建地區招生，生源有限。相比之下，金女大地處首都南京，學生以江浙地區為主，面向全國招生，生源充足。金女大建校 20 周年時統計，其學生來自全國 17 個省和南洋地區的 80 所中學。㊳ 作為教會大學，金女大和華南女大都收費很高，非社會中上層家庭無力負擔，而華南女大所處的福建地區不如金女大所處的江浙一帶富庶。此外，華南女大嚴格要求學生須出身於教會女子中學，並且宗教信仰甚篤，而當時福建一省教會辦的女子中學畢竟有限，要從數量有限的學生中挑選出合乎要求的高材生更非

㊳ 同註⑥。

易事。㊴ 在這方面，華南女大為了保持其教會學校本色，秉持著寧缺毋濫的原則。

由於華南女大發展慢、規模小，學生來源和畢業生的去向主要面向福建一隅，帶有強烈的地域色彩，其影響也始終未能超邁「華南」，走向全國。相對而言，金女大無論是學生來源、畢業生的成就，還是社會知名度，在當時中國均具有比較廣泛的影響。

作為教會大學，具有宗教色彩自然是兩所學校的共同特徵。但金女大向國民政府立案註冊以後，宗教色彩逐漸淡薄，世俗化特徵日趨明顯。從30 年代初開始，金女大將宗教課改為選修，一切宗教性質的活動改為自由參加。金女大宗教系從設立到取消，只存在了 3 年（1926–1929 年），前後主修宗教教育的畢業生只有 1 人。㊵ 信教的教師對不信教的學生從不施加壓力。金女大學生在前期以來自信教家庭和教會女中為主，到後期，特別是戰時西遷成都後，來自信教家庭和教會女中的比例明顯下降。金女大學生畢業後，獻身宗教事業者也很少。據 1947 年統計，在金女大已畢業的 1 至 29 屆 703 人中，只有 11 人從事宗教工作，僅占 1.5%。㊶

華南女大則不同。在 13 所基督教大學中，華南女大以始終保持濃厚的宗教色彩而著稱。在近半個世紀的歲月裡，該校所有的教育教學活動一直緊緊地圍繞著傳播基督精神、培養高級女教牧人員和虔誠的女教徒這一中心目標來進行。即使在 30 年代教會大學世俗化的浪潮衝擊下，其辦學宗旨依然一如既往。在該校的課程和課外活動中，宗教灌輸和宗教活動始終列為首位。據稱該校宗教教育系這一學科開設的課程曾多達 11 項，共 34 學分。㊷ 此外，其他系結合自己的專業還開設有專門性的宗教課，如教育系開設有宗教教育原理、宗教教育設施、藝術與宗教教育、宗教心理與哲學等。該校課外活動，諸如每晨禮堂聚會、晨間禮拜（後改為課間禮拜）、主日教堂禮拜、耶穌受難周、查經班以及邀請教會名人演說等，宗教氛圍

㊴ 郭肇民：〈私立華南女子文理學院歷史概述〉，見《福建文史資料》（福州，1988 年），輯 20，頁 100。

㊵ 同註⑮，頁 30。

㊶ 同註⑱，頁 41。

㊷ 同註㊴，頁 99。

非常濃厚。連該校日常習用語彙，亦帶有宗教色彩。如教師上課叫做「講書」，學生聽課叫「聽講書」，學生到學校叫做「到書齋」。教會女校在初期稱作「書齋」。「聽講書」原指在禮拜堂聽牧師講《聖經》。該校各科課程，除國學課外，一律由篤信宗教的女師姑擔任。該校歡迎獨身的中國師姑當教師。獨身師姑如徵得校方同意和男教徒結婚並請牧師作證婚人則可，如與非教徒結婚，或雖是與教徒結婚但未徵得同意並請牧師作證婚人，就會被視為違反基督信條而遭譴責或非議，不得不自動去職離校。在教會的控制和支持下，該校在相當程度上實現了教會的培養目標。到 1926 年，該校共畢業 38 名學生，全部信奉基督教，其中有 24 人在教會學校任教。[43] 在該校以後的歷屆畢業生中，總有相當比例的人在教會所屬學校、醫院或其他教會機構工作。資助差會對此感到非常滿意和自豪。據 1936 年中華基督教教育會統計，華南女大在校學生信奉基督教者占 80% 以上，成為教會大學中學生信教比例最高的 3 所大學之一（其他兩所是齊魯和福建協和）。[44] 據稱，在國內外宗教界，該校師生也頗為活躍。1922 年春，該校派代表參加世界學生基督教同盟大會。1924 年該校校友又應邀參加了在倫敦召開的國際基督教女青年會議。諸如此類，使華南女大在基督教教育界享有相當的聲譽。但在另一方面，該校由於濃厚的宗教色彩而與中國民眾相隔絕，[45] 大大減弱了該校在中國女子教育界的地位和影響。這一狀況直至抗戰軍興，學校當局為順應時勢而調整辦學方針後，方有所改觀。

華南女大和金女大儘管在辦學規模和社會影響方面差距甚大，但同為教會女子大學，兩校在辦學形式和校園文化等方面，仍具有一些相通和相似之處。這些相通和相似之處最能反映出教會女子大學的特色。

㈠學校生活家庭化。在兩所女子大學中，學生與學生之間、學生與老師之間、學生與學校領導之間，人際關係都比較融洽，並呈現出溫馨的家庭生活氛圍。特別是金女大校園中，這一氛圍十分濃厚。該校「每一宿舍

---

[43] 同註③，頁 125。

[44] 中華基督教教育會：《關於在華教會大學宗教生活的報告》（上海，1936 年），頁 6–7。

[45] 同註③，頁 125。

有交誼室及飯廳，教師於課餘之暇，與學生相處如姐妹，師生之間，彷彿一家之人；同學之間，更有姐妹班之組織」。㊻「姐妹班」為金女大所獨創：三年級與一年級結成姐妹班，新生宿舍中，每個寢室有一位高年級的「姐姐」同住，以便在生活和學習方面照顧和引導初來乍到的新同學，使那些剛剛離開家庭的「妹妹」能很快地適應新的校園生活，同時也使當了「姐姐」的高年級學生學會關心和照顧別人。這一制度對培養學生之間互助友愛精神，消除低年級與高年級學生之間的隔膜，頗見成效。事實上，在金女大，親生姐妹同校者亦頗常見，少則姐妹兩人（如嚴彩韻與嚴蓮韻；凌佩芬與凌佩馨），多則姐妹四、五人（如謝家四姐妹：謝文秋、謝文蓮、謝文梅、謝文息；陳家五小姐：陳竹君、陳黃麗明、陳信美、陳沈佩蘭、陳越梅）。除姐妹同校外，還有母女同校（如曾季肅與曾彌白；章展與朱人嫻）、姑侄同校（如黃孟姒與黃續漢）。㊼這一方面反映金女大受學生及家長信任愛戴的程度，另一方面更烘托出金女大的大家庭生活氛圍。

除「姐妹班」制度外，金女大還率先在全國大學中推行導師制，每位學生可找一位教師作自己的導師。一位導師帶八、九個至十餘個學生不等，用小組活動或其他方式幫助學生解決學習、生活及其他方面的問題。導師制的推行，密切了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教師對學生的言傳身教，影響甚大。這一制度直到三、四〇年代才在全國高校中比較普遍地推行，而金女大在成立後的第二年（1916年）便已實行了。五四以後，中國國立大學學風普遍有「囂張」之勢。學生與學校領導之間經常處於一種緊張對立的狀態。而在金女大，學生與學校領導之間從來沒有發生過大的衝突。校長吳貽芳猶如一家之長，關懷和愛護校園群體中的每一個成員。她執掌校務20多年，對數以百計的畢業生不少能叫出她們的名字。在她的主持下，金女大就像一個溫馨和睦的大家庭。許多金女大畢業生在回憶學校生活時，都認為金女大同學之間親如姐妹，師生之間如同母女的校園氛圍給

㊻ 同註⑥。

㊼ 金陵女子學院編：《金陵女兒》（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年），頁8、11、25、59、73、174、380。

她們留下了良好深刻的印象。⑱ 抗戰時期，金女大在一次新生教育周活動中，舉辦了一堂別開生面的講座，即由教職員向新生介紹「金陵的家庭生活」，⑲ 這說明金女大已有意識地將這種「家庭生活」作為其校園文化特色加以弘揚。

在華南女大，雖然沒有推行類似「姐妹班」之類的制度，但因為學校規模小，同學之間、師生之間彼此接觸十分頻繁，幾乎每一個學生都能得到教師的個別指導。據 1934 年統計，該校教職員與在校學生的比例為 2 比 5，⑳ 即平均 5 個學生可以得到 2 個教師的指導。師生之間來往頻繁，關係親密。大部分學生畢業後對母校有著強烈的感情，不少畢業生願意作出經濟上的重大犧牲而回校任教。㉑ 諸如此類，都表明家庭化的校園生活對學生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㈡校風嚴謹、保守，畢業生獨身率高。教會女大初創之時，中國女子高等教育尚未興起，為了能在中國傳統勢力尚十分強勁的情況中求得生存，減輕保守觀念的阻力，教會女校當局有意識地強化對學生的管理，以免給反對者以藉口。那時學生大多來自上流社會，學生家長希望自己的女兒能在教會女校既能學到西方現代知識，又能保守中國傳統規範，以便日後能找到一個稱心如意的女婿。教會女校為了維護自身在中國上流社會中的良好聲譽，只得順應這一要求。另一方面，來華女傳教士自身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也還不夠開放，有的還秉持著維多利亞時代的一些保守觀念。因此，在初創時期的教會女子大學裡，校風嚴謹有餘，偏於保守。尤其在師姑主政的華南女大，學校對教師和學生的管理非常嚴格，男女授受不親被學校當局視為戒律。多數課程由篤信宗教的女師姑擔任。國學一門不得已須聘請男教師時，也盡量選聘科舉出身又受過教會洗禮的老先生擔任。女教師有專用的備課室和休息室，男教師不得入內。男教師還不能進膳廳和女教師、女學生一起用飯。連工友也多聘用一些信教的農村貧苦女

---

⑱ 《吳貽芳紀念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7 年），頁 141–178。

⑲ 同註⑱，頁21。

⑳ 國民政府教育部編：《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1936 年10 月出版），頁 128–129。

㉑ 同註③，頁 125。

性擔任。[52]

在金女大，男女界線雖不如華南女大森嚴，但學校當局對教師和學生的管理也十分嚴格。金女大初期教職員均為女性，以後雖陸續聘有男教師，而女教師仍占絕對多數，據 1945 年統計，在86 名教職員中，女性占 67 位。[53] 這種情況在國人自辦女子大學中是看不到的。1943 年，有一名金女大學生投書《現代婦女》雜誌說：「不但我們全體同學是女的，校長、主任及許多教授也全是女的」；學校「宿舍設備之齊全，管理之嚴密，皆甚於任何大學。學校當局認為女子應該特別遵守規矩。訓導處幾位負責的先生整天忙著點名，尤其晚歸的同學，特別被認為是危險分子，加以嚴厲的處罰。我們生活在沉悶、平淡無味的學校環境裡，缺乏一種生命的活力。只要是同系的同學，生活學習可說完全相似」；「由於生活的單調無聊，她們切望著從舞伴中找到合意的朋友。這種低級的願望當然往往成為不可能的事」。「女同學中有一種畸形的現象，就是男女間社交過於偏狹，同性朋友固然不多，異性朋友更僅限於一二人。如果多得三四個，就不免受旁人的批評，學校方面更認為少交些異性朋友為妙」，[54] 這是抗戰時期金女大的情形。事實上，金女大西遷成都後，對學生的管理已較戰前寬鬆。儘管如此，相對於男女同校的大學而言，女子大學顯得單調、沉悶，缺乏男女社交機會。加之教師中獨身老處女多，對學生也不無潛移默化的影響。各種資料顯示，兩所教會女子大學畢業生晚婚和獨身的比例甚高。早在 20 年代末，就有人注意到金女大畢業生晚婚和獨身者多。他們統計金女大 1919–1927 年畢業的 9 屆 105 人的婚姻，發現已結婚的僅占16%。[55] 對此，當時有人分析其原因，大致有這樣幾個方面：[56]

(1)金女大是當時中國「唯一而堪稱為整個且不受政潮影響」的一所女子大學，其學生驕傲自尊，令人不敢高攀。

(2)當時女子受教育的機會遲，等到大學畢業時，「已非三十以上，即

[52] 同註[39]，頁 106。

[53] 同註[18]，頁 32。

[54] 冬：〈生活在金陵女大〉，見《現代婦女》，1943 年，卷2 期 1。

[55] 江君：〈配偶問題的兩點〉，載《金陵周刊》，1928 年，期 24，頁 4。

[56] 克彬：〈女學生變成老姑娘的原因〉，見《金陵周刊》，1928 年，期 25，頁 7–8。

二十五歲有餘」，過了婚嫁的最佳年齡（那時中國女子的平均結婚年齡為 17 歲）。[57]

(3)當時男女社交尚處於半開化狀態，在女子大學接觸異性的機會極少。

(4)認為自己是中國第一代女大學生，不願因結婚和生育而羈絆自己的學問和事業。

金女大早期畢業生如此，後期畢業生亦同。據 1947 年的調查，在165 位金女大畢業生中，已婚者 74 人，占 44.8%；訂婚者11 人，占 6.6%；未婚者80 人，占 48.4%。[58] 筆者查閱 1947 年〈中華全國大學婦女會會員登記表〉，在 262 名會員中，有80 人畢業於金女大。統計這 80 人的婚姻狀況，除 4 人不詳外，已婚者 48 人（ 60%），未婚者 28 人 (35%)。未婚者中，年齡最幼者為 26 歲，最長者為59 歲，平均年齡為 40 歲。[59] 在當時中國社會背景下，金女大畢業生晚婚和獨身的比例無疑是相當高了。據稱這一情況在華南女大畢業生中也同樣存在。

㈢政治參與意識淡薄。五四以來，中國學生的政治參與意識極強，每一場大的政治抗爭和救國活動，無不以學生為先導。在這方面，教會大學學生的情緒和行動，常常不如非教會學生之高昂激烈。在教會大學中，女學生又不如男學生之主動積極，兩所女子大學學生對政治尤為淡漠。金女大學生雖然參加了五四運動，但當五卅運動發生時，金女大學生便開始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參加，一派反對參加。九一八事變時，金女大學生雖然成立了抗日救國分會，但沒有舉行示威。[60] 抗戰爆發後，雖有學生參加了抗日救亡活動，並作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抗日救亡工作，但參加人數有限。1946 年金女大從成都遷回南京後，學校的政治空氣非常沉悶。是年美國兵強姦北大女生沈崇，全國學生群情激憤，金女大校園卻異常平靜。其後，

---

[57] 喬啟明：《中國農村社會經濟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46 年），頁 283。

[58] 劉義馨：〈畢業同學就業調查〉（ 1947 年金女大學生畢業論文），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 668，案卷號 156。

[59] 〈中華全國大學婦女會會員登記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全宗號 648⑷，案卷號 308。

[60] 德本康夫人 (Mrs. Laurence Thurston)：《金陵女子大學》，同註③，頁 312。

南京五二〇事件及浙大學生于子三在獄中被殺事件，雖有外校學生前來串聯，而金女大學生卻沒有走出校門去參加。[61] 直到1948年秋，金女大才正式建立中共地下黨支部。[62] 這在當時全國高校中算是比較晚的了。

在華南女大，學生的政治意識更加淡薄。據說該校學生連九一八抗日救亡運動都根本沒有參加，[63] 完全與當時中國政治生活相脫離。

金女大和華南女大學生政治意識淡薄的原因，一是兩校學生的家庭背景所致。兩校均有「貴族學校」之稱。學生多為政府官吏、自由職業者、地主和資本家的千金小姐，生活比較富裕。在一般的情況下，富裕往往使人保守。二是學校的教會背景使學校當局對學生的思想控制比較嚴密。宗教教義的灌輸逐漸消弭了學生的「異端」觀念。此外，女子溫和柔順、循規蹈矩的性格和傳統觀念對女性的束縛，也是導致其政治意識淡薄的因素之一。

㈣重視社會服務和社會實踐。教會大學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辦學特色。其中各個學校的校訓往往高度概括了各自的辦學宗旨。金女大的校訓「厚生 」和華南女大的校訓「受當施」，用詞雖然不同，含意卻頗有相似之處。「厚生」一詞源自《新約》約翰福音十章十節：「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要豐盛。」其意與耶穌所說：「我來不是要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的含意相近。金女大用「厚生」作校訓，含意又作了進一步的引伸：「人生的目的，不光是為了自己活著，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來幫助他人和社會，這樣不但有益於別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豐滿」。[64] 金女大以此為培養學生的宗旨，時時告誡學生：「為人處世，是施予，不是取得；是寬容，不是報復；是犧牲，不是自私」。

華南女大的校訓「受當施」亦是教導學生怎樣處理自己與他人、個人與社會以及權利與義務的關係。施予比獲取更可貴，義務比權利更重要。

---

[61] 同註⑮，頁 29。

[62] 同註⑱，頁 46。

[63] 同註③，頁 312。

[64] 同註⑮，頁 20。

幫助他人，服務社會，人生更富有意義。兩所女大不約而同地以此精神作為培養學生的指導思想，並通過學校生活的各個方面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引導學生朝著這個方向努力。

在「厚生」和「受當施」精神指引下，兩校學生均特別重視社會服務和社會實踐，金女大專門設有社會服務處，號召學生積極參加社會服務活動。社會服務處為失學兒童開辦小學，設立平民診療所、樂群社、家政學校等。該校學生自治組織「厚生團」內有一個「進德部」，專門組織社會服務活動。在社會服務處和進德部的主持下，該校學生通過接觸和走訪市民、農民以及婦女兒童，了解他們的困難和需要，有特定性地開展服務工作。抗戰時期是金女大和華南女大學生社會服務活動最活躍的時期。金女大在四川仁壽縣設有頗具規模的鄉村服務處，內設婦嬰組、幼教組、挑花組和雞種改良組，組織和訓練農村婦女，提高其知識水平，增加其生產技能，並為她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深受當地婦女群眾的歡迎和信任。此外，金女大還在華北壩辦有「兒童福利實驗所」並與華西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合作設立「兒童行為指導所」，為貧苦兒童和行為異常兒童提供義務教育和免費治療。[65]

在戰時閩西北山區，華南女大學生也在進行著同樣的社會服務工作。戰前華南女大曾組織有「推廣婦女服務部」。內遷南平後，學校將這一組織擴大為「社教推廣委員會」，規定全校學生都須參加社教工作。每個學生每周至少要從事社教工作 1–2 小時，在社教的各項活動中擔任一項服務工作。和金女大一樣，該校的社教活動亦以婦女兒童為主要服務對象。社教活動的內容包括開辦婦女兒童義務夜校，開設家庭婦女進修班，舉辦婦女兒童福利事業等。[66]

金女大和華南女大在戰時開展的一些社會服務工作，在抗戰勝利復員後仍然繼續進行。這些看起來瑣屑、不起眼的工作，卻深受下層民眾的歡迎。近代中國女權運動的最大缺失之一就在於上層精英女性與下層平民女

㊅ 蕭鼎瑛：〈抗戰期間遷蓉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見《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總第 9 輯，1985 年，頁 188。

㊆ 同註㊴，頁 103–104。

性相脫離。上層女性只顧爭取自身的參政權、選舉權和職業權，不屑或不願深入下層工農婦女民眾，不了解也不關心下層平民女性的需要和困難。早在 1923 年向警予就痛切地指出：中國知識婦女開展的女權和參政運動缺乏群眾基礎，反不如「基督教婦女能深入群眾比較有力」。[67] 金女大和華南女大學生在社會服務方面與基督教婦女運動同出一源，亦可視為基督教婦女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兩校通過開展社會服務和社會實踐活動，加強了學生對服務人生的信仰，並使學生從實踐經驗中體認到社會服務的意義和價值。「厚生」和「受當施」的精神種子，就在這樣的實踐活動中像春雨一般滋潤和植根於每個學生的心田之中，並演化為一種人格力量，終生伴隨著她們，滲入到她們的工作、生活和家庭，乃至浸染她們的後代。「為社會服務」成為近代教會女子大學畢業生的共同追求和生活信仰。

四、知識女性的培養：教會大學與國立大學之觀照

在 20 世紀上半期的教會高等教育中，女子高等教育究竟處於一種什麼樣的地位呢？杰西·格·盧茨認為：「教會大學重視婦女教育」、「傳教士貢獻較大的兩個領域是女子高等教育和現代醫學與護理教育」。[68] 相對近代中國人自辦女子高等教育而言，這一論斷毋庸置疑。但若拿教會女子高等教育同教會男子高等教育作一比較，兩者的差距便一目瞭然：教會女子高等教育不僅起步較晚，而且發展不平衡。教會大學男校大多起步於 19 世紀末，而教會女子大學到 20 世紀初才問世。在五四以前，教會女子大學只有 3 所，其他十餘所教會大學只招男生。在 3 所女子大學中，華北協和女大只存在了 15 年。其餘兩所雖然維持到 50 年代初，但相對於一般教會大學而言，發展比較緩慢。在 30 年代被公認的 13 所基督教教會大學

---

[67] 向警予：〈中國最近婦女運動〉（1923 年 7 月），見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 (1921–1927)》（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93。

[68] 同註③，頁 122。

中，金女大在校學生人數常列第 10 或第11 位，⑲ 而華南女大則忝居末位。五四以後，教會大學男校雖然相繼開放了女禁，而且女生的比例不斷上升，但是直到 40 年代末，在男女同校的教會大學中，女子教育仍然是其薄弱和次要的一環。

當然，在當時中國的歷史環境和時代背景下，要求教會大學實現男女教育機會均等難免有些苛求。因為即使在同時期的美國大學也未能完全做到男女均等。如拿同時期的國立大學（此處指國人自辦大學，包括國立、省立和私立）作一比較，教會大學在女子教育方面尚處於領先地位。

首先，教會大學最早開創了中國的女子高等教育。在五四以前，中國政府一直不重視女子高等教育。直到 1919 年 4 月，北京女子師範學校改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國立女子大學才正式面世，比第一所教會女子大學創辦晚 14 年。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成立後，發展十分艱難。由於受當時中國動盪政治的影響，這所國人自辦的唯一的女子大學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對此，我們只要從該校校長的頻頻更換和學校所屬關係的一改再改即可窺其一斑。在 1919 年 4 月至1924 年2 月不到 5 年的時間裡，該校校長先後六易其人。⑳ 1924 年 5 月，該校改名為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次年 8 月，因校內發生風潮，被當時教育總長章士釗下令解散。同年 12 月，段祺瑞又下令恢復。1926 年 9 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將其改為女子學院師範大學部。1927 年 8 月，復改稱國立北平大學女子第一部。1928 年 11 月，再改稱國立北平大學第二師範學院。1931 年7 月，併入北平師範大學。㉑ 從此，這所國立女子大學不復存在。在民國時期，國人自辦的女子大學還有兩所。一所是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一所是四川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前者由北洋女子師範學堂發展而來，1929 年 6 月正式成立；後者創設於 1940 年。㉒ 這兩所學校因為都是半路起家，歷史都不長。因此，在 20 世紀上半期的中國，沒有一所國立女子大學自始至終地辦下來，或中途

---

⑲ 同註⑥。

⑳ 北平師範大學編：《國立北平師範大學一覽》（1934 年 8 月），頁25–27。

㉑ 同上。

㉒ 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編：《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五周年紀念特刊》（1945 年 12 月），頁 3。

夭折，或半路起家，只有華南女大和金女大相對獨立地持續穩定地發展了三、四十年。其次，3 所國立女子大學均是師範性質，系科和專業設置不如金女大寬泛，畢業生出路更不如金女大廣闊。在 3 所國立女大中，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要算是歷史最長的了。就規模而言，該校在校學生人數在 30 年代初即已超過了金女大，但其校產設備、圖書資料、師資力量、辦學水平、校園文化環境以及畢業生的成就等，均不可與金女大等量齊觀，其聲譽和影響遠遜於金女大。金女大在近代中國女子高等教育界獨占鰲頭的地位一直沒有受到國內同行的挑戰。這一點與一般教會大學有所不同。一般教會大學大都經歷了一個從開創者到追隨者，從主角到配角的演變過程。也就是說，在清末民初，一般教會大學擔當著中國高等教育開創者和主角的重任，20 年代以後，隨著中國人自辦大學的迅猛發展，教會大學的主角地位開始受到挑戰，漸漸退居配角的地位。而兩所女子教會大學儘管在 13 所教會大學中處於劣勢，但因國人自辦女子高等教育一直十分薄弱，以致於形成「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的格局。

金女大在民國時期女子教育界具有如下幾點鮮明的特色：

第一，對上流社會的吸引力。金女大學生多來自上層社會家庭。不少達官貴人和富商大賈將自己的女兒、孫女送入金女大學習。如寧波籍富商、上海總商會第一任會長嚴筱舫的兩孫女均畢業於金女大。⑬ 據稱 1921 年金女大學生中有一位是前任總理的侄女和一位總督的孫女。⑭ 到三、四〇年代，又有一些國民黨要人和社會名流的千金小姐進入金女大就讀。如張治中之女張素我、章太炎之女章展及外孫女朱人嫻、沈鈞儒之女沈譜、凌鴻勛之女凌崇英、徐悲鴻之女徐麗麗（徐靜斐）、賈景德之外孫女王粹珍。⑮ 孔祥熙的兩個女兒孔令儀和孔令俊亦分別在金女大和金女大附中肄業。據 1934 年金女大學生的家庭職業統計，占第一位的是政界，其次是商界和學界。⑯ 金女大被當時人們視為貴族學校不是沒有理由的。在一般情

⑬ 金陵女子學院編：《金陵女兒》（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年），頁 25。

⑭ 金陵女大：《六年的回顧：1915–1921 年》，頁 36。

⑮ 同註⑬，頁59、140、170、239、281、372。

⑯ 同註㊿，頁 170。

況下，學校能吸引上流社會的子女，常是其社會影響的重要表徵之一。

第二，得到中國官方的青睞。金女大自 1930 年向國民政府教育部立案後，開始受到政府當局的關注。1934 年，金女大歲入經費來源中，就有國民政府教育部撥款 9,000 元，而同期河北省立女子師範學院卻沒有得到。1935 年，金女大建校 20 周年，蔣介石、孔祥熙、戴季陶、居正、王世杰、孫科、葉楚傖、邵元冲、鈕永建、羅家倫、宋美齡、張默君等一大批國民黨要人紛紛題詞祝賀，盛況空前。當時《申報》以一整版的篇幅予以登載和報導，聲勢十分壯觀。⑰ 1936 年，宋藹齡、宋慶齡、宋美齡三姐妹為金女大捐建附中宿舍一座。1937 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補助金女大三位教授講座費 1.2 萬元，次年，教育部又補助 5,000 元，四川省政府補助 2.5 萬元，此後，金女大幾乎每年都能得到政府當局的補助。數額雖然有限，但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政府當局對金女大的關注。除此之外，金女大教師還多次受到教育部的獎勵。1941–1944 年間，獲得教育部獎勵的金女大教授多達 28 人次。⑱ 由於金女大在當時全國女子高等教育界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政府和其他機構需要婦女代表的時候，常從金女大教師和畢業生中物色和選拔。金女大校長吳貽芳被譽為當時中國知識女性的楷模；1933 年，吳貽芳被推舉為芝加哥國際婦女大會的中國代表；1937 年當選為「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執委，並應邀參加宋美齡在廬山舉行的全國婦女領袖會議，討論戰時婦女工作；1938 年，吳貽芳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1–1947 年當選為國民參政會五人主席團成員；1945 年擔任聯合國舊金山會議代表。作為金女大的首屆畢業生和校長，吳貽芳的榮譽自然也是金女大的榮譽。

第三，畢業生的卓越成就。畢業生的成就和工作實績是評價一所大學地位和影響的重要指標之一。五四以後，中國女子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逐漸增多。30 年代中期，全國大學在校女生一般在三、四千之間。到 40 年代中期，全國大學在校女生人數逾萬。但是女大學生人數的增多並不意味著女性知識人才的等量增長。因為當時相當多的女子接受大學教育後，重新

---

⑰ 同註⑥。

⑱ 同註⑱，頁 21–28。

回到家庭，「既不願從事職業以服務社會，更難立志作大事……以結婚為職業，受教育也不過是為選擇一個較好的夫婿的準備而已」。⑲ 相比較而言，金女大畢業生的就業率和成材率相當高。早在30年代，金女大畢業生即以「服務社會，均以勤懇負責，得蒙社會人士之信任」而著稱。⑳ 1934年前後，中國首次出現大學畢業生失業風潮。當此職業問題嚴重時期，金女大畢業生卻有供不應求之勢。據1935年該校職業介紹部統計：「最近三年來，各方向本校聘請之人數超過畢業生數的三倍，足徵社會人士之信任本校畢業生；至謀深造者，數逾全體畢業生四分之一，以此而論，在國內殊不多見」。㉑ 深造率和就業率高是金女大畢業生的特徵。1947 年，該校對32 年來歷屆畢業生的情況作了一次全面調查。調查結果，畢業學生共29 屆，本科生共計 732 人，其中已去世的29 人，現存703 人。703 人中畢業後再深造者計191 人，占 27%，內獲博士學位者38 人，獲碩士學位者73 人，獲護士學位者12 人，在國內繼續研究者2 人。703 人的就業情況：服務於教育界者242 人（其中大學校長1 人，大學教授、行政人員60 人，中學校長或主任29 人，中學教員152 人），從事社會服務事業者89 人，公務員66 人，醫生護士33 人，寫作及編輯8 人，升學與研究68 人，家庭服務142 人，宗教工作11 人，其他及不詳44 人。㉒ 在婦女職業十分狹窄的舊中國，金女大畢業生能在各個領域立足並取得較好的成績，誠屬不易。正如吳貽芳所言：「金女大畢業生雖然不算多，但在當時大學女畢業生還不多的情況下，她們在我國婦女界高級知識份子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其中有相當一部分在我國的教育工作、科技工作及其他領域有一定的貢獻」。㉓ 與同時期其他幾所女子大學相比，金女大畢業生的成就是相當突出的。

除專門性的女子大學外，一般男女同校的教會大學對近代中國的女子

---

⑲ 潘錦瑞：〈今日中國女子教育的檢討與改進〉，載《婦女文化》，卷3，期1，1948年4月。

⑳ 同註⑥。

㉑ 同上。

㉒ 同註⑱，頁41。

㉓ 同註⑮，頁16。

高等教育也作出了重要貢獻。20 年代初，教會大學女生約占全國大學女生總數的 40%。進入 30 年代以後，教會大學所培養的女生在全國大學女生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一般保持在 25–30% 之間（見表 4）。作為外國在華高等教育機構，在與國立大學的激烈競爭中，在缺少本土優勢的情況下，仍能保持這樣的規模，誠屬不易！

表 4　教會大學女生人數及比例

年　　代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1934 年
教會大學女生人數	825	941	1,229	1,236
占全國大學女生的比例	24.9%	28.6%	32.9%	30.9%

資料來源：根據《全國高等教育統計》（1931–1934 年度）有關資料整理而成。

再從男女生的比例來看。1922 年，國立大學女生（537 人）占其學生總數（30,860 人）的 1.7%，而教會大學女生（350 人）占其學生總數（4,020 人）的 8.7%。到 30 年代，教會大學女生占其學生總數的比例上升到 20–25%（見表5）；到40 年代，進一步上升到 30–35%，均高於同時期國立大學女生所占的比例。這從一個側面表明教會大學比國立大學更加重視婦女教育。儘管「傳教士教育工作者未必一定是男女平等主義者，但他們為婦女在更大程度上的獨立奠定了基礎」。[84] 可以說，在第一代中國新知識女性的成長過程中，教會大學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母體角色。

表 5　教會大學男女生的比例

年　　代	1931 年	1932 年	1933 年	1934 年
全國大學（包括教會大學）女生占全國大學學生總數的比例	12.2%	12.3%	13.6%	13.9%
教會大學女生占教會大學學生總數的比例	20.6%	22.9%	24.8%	24.5%

資料來源：根據《全國高等教育統計》（1931–1934 年度）有關資料整理而成。

---

[84] 同註③，頁 497。

大學不僅是一個傳播文化、灌輸知識的場所，也是一個塑造人格、濡化品性的場所。一個大學的校風對其學生的思想品德、價值觀念和行為規範均具有一定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教會大學出身的知識女性，在經過西式且帶宗教色彩的高等教育洗禮之後，其品行自然或多或少濡染了一些異於非教會大學畢業生的成分。對此，當時的人們已發表過一些看法。一般認為，教會大學畢業的女性多半能刻苦耐勞，踏實肯幹，對於社會服務事業有濃厚的興趣。她們中多數具有較強的職業意識，事業心強，勤業敬業，自強自立，發奮自勵。缺點是生活方式歐化，不諳國情，政治意識淡薄，具有優越感。這些看法雖然有的難免以偏概全，但也多少道出了教會大學畢業女性的某些群體特徵。總體而言，在 1949 年以前，教會大學畢業的女性比國立大學畢業的女性的就業率高，其知識、能力和品行比國立大學畢業的女性更能贏得社會的肯定和信賴。筆者曾根據《古今中外女名人辭典》和《華夏婦女名人辭典》中收錄的出身於教會大學的223 位婦女名人進行統計，發現她們絕大多數是某一領域的專家學者，學有專長、事業有成。她們成名極少是「妻以夫貴」，也沒有那種「暴得大名」的新聞式人物。她們主要是靠自己出色的工作實績以贏得社會的承認。他們之中多數從事教育工作，政治活動家較少（見表 6）。

從 223 人的年齡結構來看，她們絕大多數出生於20 世紀一、二〇年代，就讀於三、四〇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她們大多處於 20–40 歲年齡段，正值年富力強和事業有為的黃金時期。她們的工作業績主要是在 1949 年以後中國的建設事業中樹立起來的。這一格局雖然與辭典收錄人物的標準不無關係，但仍然可以說明，教會大學所培養出的眾多女性人才，不僅在民國時期發揮過重要作用，而且也在 1949 年以後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進程中，貢獻了她們的一份力量。

表 6 《古今中外女名人辭典》和《華夏婦女名人辭典》中收錄的出身於教會大學的婦女名人統計[85]

(一)職位統計[86]

職　位	人數
學部委員	5
大學校長、副校長	6
大學教授	95
研究員	45
高級工程師、實業家	3
主任醫師、護理專家	7
編審、譯審	5
文學家（作家、翻譯家、劇作家、高級記者）	10
藝術家（畫家、音樂家、歌唱家、攝影家、影星）	12
中學校長、特級教師	5
部長、副部長	13
副省長	1
司長、局長	3
外交官	4
其他行政職務	4
革命烈士	5
總　計	223

(二)專業統計[87]

專業	人數	名次	專業	人數	名次
化學	45	1	教育	6	8
醫學	31	2	心理	4	9
文學	27	3	數學	4	9
生物	20	4	體育	4	9
語言	11	5	新聞	3	10
歷史	11	5	美術	3	10
社會	9	6	地理	2	11
經濟	8	7	其他	4	
物理	8	7	不詳	17	
音樂	6	8	總計	223	

[85] 中國婦女管理幹部學院編：《古今中外女名人辭典》（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 年）；周行鍵主編：《華夏婦女名人辭典》（北京：華夏出版社，1988 年）。

[86] 「職位」指各人任職中最重要的職務。有多項任職者，僅擇其一。

[87] 「專業」主要指學校所學專業；少數所學專業不詳者，取從事的專業。

(三)出身學校統計

學校	人數	名次	學校	人數	名次
燕京	59	1	華西	10	7
金陵女大	34	2	金陵	9	8
輔仁	27	3	嶺南	9	8
聖約翰	15	4	華南女大	7	9
齊魯	13	5	其他	15	
東吳	13	5	總計	223	
滬江	12	6			

(四)出生年代統計

出生年代	相當年齡（1949 年）	人數
1900 年以前	49 以上	9
1901–1910	39–48	31
1911–1920	29–38	75
1921–1930	19–28	101
1931–1932	17–18	7

五、餘論

以性別觀念去分析和解構一個民族、一種傳統，以及一個較長時段的歷史，越來越成為婦女研究和史學研究的一條新的蹊徑。用性別分析的方法研究近代中國的歷史，同樣具有普遍的價值和意義。

在 1840–1949 年這一時間段落裡，古老的中國經歷了其開天闢地以來最為驚天動魄的衝撞和變遷。千年不變的傳統社會發展模式在 19 世紀中葉以後，簡直可以以「十年一變」的頻率來考量。[88] 從人的現代化角度來看，無論是男人還是女人，都經歷了一場洗心革面的社會變革，而中國女性的現代化幅度又比男性更為劇烈，從身體、婚姻和家庭，到教育、經濟

[88] 唐德剛：〈論「轉型期」與「啟蒙後」〉，見歐陽哲生：《自由主義之累 —— 胡適思想的現代詮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一書序。

和法律地位，中國女性都宛如經歷了一場「不流血的絕大社會革命」。[89]

在中國女性的現代化進程中，教育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婦女接受教育本身不僅是婦女社會地位提高的一個重要標誌，同時更重要的又是婦女解放的一個能動力量。在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上，西方傳教士扮演了一個起始性的母體角色。當教會女學在中國初興時，由於女子教育在中國傳統教育領域中本來屬於空白地位，故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人對教會女學的態度更多的是漠視而非敵視。事實上，不僅是中國人，連傳教士自身最初也幾乎沒有意識到他們所創辦的女學在何種程度上起著破壞中國傳統的作用。

如果說，早期教會女學的作用主要表現在衝擊中國傳統和開風氣的話，那麼，後期教會女學，尤其是教會女子高等教育的貢獻則主要表現在新知識女性人才的培植方面。只要翻開任何一部中國女性名人辭典，對此結論就會毫無置疑。在 20 世紀上半期受過高等教育的中國女性，將近有 1/3 出身於教會大學，而同期的女子留學生中，出身於教會大學者更占多數。由於教會大學與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直接關聯，並因其重視英語教學等緣故，教會大學畢業生出國留學的比例遠遠高於同時期的國立大學。以至於教會大學被時人呼為「留洋預備學校」。無疑，教會大學為 20 世紀上半期的中國女性提供了一個直接接觸和瞭解西方現代文化的窗口。即使當這個窗口關閉以後，她們仍傾其所學奉獻於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其餘音遺韻甚至一直流傳至今。

---

[89] 胡適之語，引自呂芳上：〈抗戰時期的女權論辯〉，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頁 81。